

憶 語 言 學 大 師 李 方 桂

◎ 馬 逢 華 (旅美學人名教授)

四 分 之 一 世 紀 交 情

李方桂先生於一九八七年八月二十一日以中風不治，在加州紅木城溘然長逝，對我震撼至深。我初識李先生，是在一九六〇年七月。那時我初出茅廬，以「資淺代表」的身分，從加州柏克萊到西雅圖出席華盛頓大學主辦的中美學術合作會議。李先生夫婦以地主之誼，招待與會的中國代表們晚餐，得有機會拜見討擾。一九六一年六月起，我到華盛頓大學任教，成了李先生的晚輩同事。我與他的三位男女公子，又都成爲好友，對李先生及夫人很自然地尊稱爲仁伯和伯母。兩位長者都對我親如家人子弟；這種關係，不知不覺已經超過了四分之一世紀。

八月二十二日初聞噩耗，我竟然不敢立刻打電話去安慰徐櫻伯母，因爲想到伯母需要一段清靜的時間，獨自哀悼，不受干擾；而且自己心中過份悲哀，也不知從何說起，所以只寄片箋，垂淚寫了幾句。過了幾天，至友勞延煊、張念英伉儷從俄州電告，他們已和李伯母通了電話，知道伯母頗能節哀，非常鎮定。延煊說：「你們現在

可以打電話去了」，這才鼓起勇氣，與伯母在電話中詳談李先生去世前後的種種情形，並且請她千萬保重。現在李先生遠去已多時，而我底心情仍然恍惚悵悵，難以接受一個沒有李伯伯的世界。過去二十六年中，親炙他的種種細節，時時浮現眼前。

最 後 午 餐 兩 項 識 語

回憶一九八七年三月二十一日，李伯伯和伯母從加州來。我家前院一大棵中國玉蘭正在怒放，粉雕玉琢似的開了滿樹，在陽光之下照人眼明，兩位前輩連連稱讚。大家在玉蘭花前照了幾張照片，然後高高興興地一同到水開公園附近午餐，飯後遊園。同去的還有安德妹和李先生夫婦最鍾愛的小外孫白大成。那天中午吃飯，是在一家海鮮速食小店。每人分別要了些蛤蜊洋芋羹、炸魚、炸蝦之類的道地西城食品，吃得津津有味。我陪坐在李先生右側，邊吃邊談；他談得高興，不知不覺把我所叫的一小筐炸葱圈吃去了一大半。自從五年前他經過心臟換管手術之後，我們每次見面，都覺得他龍鍾之態漸增，總是暗中祈禱

，希望他能繼續硬朗下去。那天午餐，看到他如此健飯，感到無限快慰。萬萬料不到那竟是我陪他所吃的最後一次午餐。

那天午飯以後，一同到水開公園漫步，並且在湖海交接的水開岸邊閒看風帆緩緩駛過。陽光和煦，空氣清新，陪着李伯伯和伯母慢慢談些家常，真是一個寧靜愉快的下午。但是却有兩件小事，當時使我隱隱感到有些不太尋常。一是那餐午飯，我和丁健照理應盡地主之誼，反而成了客人。李伯母事先就一再叮嚀：「每次回到西雅圖來，都是你們請吃飯。這次李伯伯一定要作東，同請你們一次。」一是在公園林蔭道上散步之時，伯母和我走在後面，她忽然輕聲地說：「逢華，碰到這麼好的天氣，我心裏總是有點兒害怕。」我問：「爲什麼？」伯母說：「不知道還能再有幾次了。」我心中一驚，趕快說：「伯母，你可不能這樣想！這樣的日子，還多着呢。」現在想來，竟然都可解爲識語。

比 較 泰 語 馳 譽 國 際

李先生的學術事業，自然不是我這個語言學

的門外漢所能置詞。一九八五年八月二十六日，泰國朱拉隆宮大學在曼谷贈送他一座榮譽獎牌，並在典禮席上，印發一份正式的褒詞。那篇褒詞，應可代表國際語言學界對他的一部份定論。全文不長，試釋如下：

「著名學者李方桂教授在比較語言學及歷史語言學方面之貢獻，久為世所共仰。先生學術研究之範圍雖然包括美洲印第安語、漢語以及泰語，但是無可諱言，在其前後五十年的學術事業中，先生之心血，主要是致力於比較泰語一科。先生之卓越成就，對於此一學科之建立與發展，極關重要。文學院謹承朱拉大學之命，對於先生之學術造詣，敬致褒揚。」

「李教授早年在中國入學受教。他在語言學方面的訓練，則於美國修習。完成博士學位以後，李教授潛心致力於歷史及比較泰語之研究。先生之著名論文如：『泰語發展沿革』以及極為重要之鉅著『泰語比較手冊』一書，不僅奠定吾人對於原始泰語及泰系語言知識之基礎，並且演證泰語與其他有關語系之關係。凡此種種，均為發其他學者之所未發。」

「李教授好學不倦，樹立了吾儕追求知識之典範。先生精通標準泰語，已可以之應用於他對比較泰語之研究工作。李教授並以寫作精確認真，一絲不苟，見稱於

學術界。其短篇論文，則反映先生有組織的思考與工作方式，和他提綱扼要，擒賊擒王的功力。」

「李教授治學一本大公，毫無偏見。先生雖然對於歷史及比較泰語極為精通，但是對於觀點不同之其他學者，一向均甚尊重。先生從不排斥異見，甚至不作反辯，往往承認同一證據可能推出不同之意見。至於李教授之樂於與同儕分享他淵博的學識，以及在研究工作上之樂於助人，則更為同業所稱道。先生每次蒞泰，輒作學術演講，並且樂於會見語言學界同人，即為一例。」

「茲為表揚李方桂教授對於學術之潛心致力，及其在比較泰語方面之卓越貢獻，朱拉大學謹此致贈榮譽獎牌，並且深以為傲。」

無邊寂寞人琴俱亡

這篇褒詞，沒有談到他在漢藏語言和美洲印第安語言等方面的重要成就，所以並不周全。但是在我看來，僅這一份份的成績，恐怕就已經很够不朽的了。我並且相信泰語研究確是他一生學術工作中興趣最大，和最為嘔心瀝血的科目。一九七七年他七十五歲，那年七月八日他從夏威夷來信，曾說：

「今年夏大出版部也出版了我的『比較泰語

手冊』，也算把我的泰語研究結束一下。前此泰國朱拉大學也出版了一本『泰語研究：致敬李方桂教授論文集』，我的泰語研究總算也受到了泰國的注意，知注均此奉聞……」

言下頗有長途跋涉遠到目的地以後，如釋重負的語氣。一九八五年九月十六日我又收到他發自加州的一封信，談到他的泰語研究，值得一錄：

「逢華我兄：前在臺北寄上一函諒已收到。現在我想寄你一本小冊子，是朱拉大學贈我獎章時印行分發的，有我的小傳及出版品目。我研究泰語近五十年，臺北沒有一個中國學生肯學，到是收了不少的泰國學生，現在也都是大學教授了，有人作了文學院副院長、東方語文系主任、語言學（系）主任等等。在美國有少數同行，此外只能默默工作。五十年來辛苦不尋常！我們知交，故敢以此小冊奉上，敬乞惠存為感。」

「朱拉大學是泰國最著名的一个大學，如臺北之臺大。忽然想起贈我獎章一座，大約是因為我的學生們都在朱拉大學教書的原故。近年來大陸民族研究所作了些泰語研究，比我當年的創始工作要好多了。研究人員也十倍於我當年。我也深以為慰！希望他們在語言學根底理論上注意，以便進一步研究泰語的比較及歷史的研究！

「胡扯一大篇，不要笑我！
即頌儼安！」

弟方桂敬啓（原信未寫日期）

當時我讀此信，頗能體會到他晚年的寂寞之感。這自然並不是說沒有親友故舊環繞身邊，笑語盈盈，而是指古今大學問家、大創作家，所獨有那種「前不見古人，後不見來者」的無邊的寂寞。今日再讀那一封信，則又平添一層「人琴俱亡」的淒涼感覺。

他在信中一則曰：「我研究泰語近五十年，臺北沒有一個中國學生肯學」，再則曰：「在美國有少數同行，此外只能默默工作。五十年來辛苦不尋常！」這兩句話，看起來是輕描淡寫，但是他一向不喜多言，他肯寫下這麼幾句，份量實在就已很重，並且實在是語重心長！

他擔任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員和院士，前後五十八年，大家「大師」長、「大師」短地叫來叫去，而他潛心致力近五十年，作了權威性貢獻的泰語研究，在臺灣却是無人肯學，沒有傳人。現在先生去矣，從高喊學術生根的臺灣角度來看，豈非人琴俱亡？所幸學術沒有國界，也沒有政治界限；泰語研究看來會在曼谷和北京繼續發展下去，他的中國門人，多在漢藏語言和古代音韻方面。

我把朱拉大學的褒詞和他一九八五年九月給我的信，抄錄下來，因為它們都是有關於李先生半個世紀的泰語研究，應該多少有些參考價值的。

言行笑貌耐人體會

作學問只是李先生的一个方面，他在作人方面的風範，實在更值得使人懷念。自從拜識先生以來二十六年間，我從未見過他疾言厲色，他總是和顏悅色，氣度從容；我也從未聽過他當面或背後批評別人，他總是苛於責己，厚以待人，比如華大的中國語文部門，一度有人弄權，處事不公，屢次有人向他告發和抱怨，他總是很誠懇地說：「都是我的錯，是我對她授權太多了，以後我會注意。」

不過如果要把握李先生的作人風範，像總結他的學術成就那樣，用文字筆之於書，則決不是我這一支無用的筆所能辦到。因為作人之道，範圍太廣，既不能過份抽象地一言以蔽之，也無法像流水帳一樣無限制地列舉下去。由此也可以想像，作人恐怕比作學問更不容易。

也正因此，他大去以後，我更感覺到自己多麼幸運，能在他從華大退休之前，有九年的時間，日常追隨左右；他們遷居夏州和加州以後，每年總也趁着假期，回到西雅圖一兩次，所以仍然可以常常見面，使我有機會從一位前輩君子底言行笑貌中，漸漸體會出一些書本上沒有的知識和道理。

我在「徐櫻女士和她底『寸草悲』」一文中曾經寫過：「認識徐櫻女士和李方桂先生的人都知道，他們賢伉儷是如何的多才多藝，慷慨好客，和如何的受到朋友和晚輩的尊敬和愛戴。」

他們居住在西雅圖的時候，東北區一零五街李宅實際上就是一個非正式的中國文化中心。每逢週末假日，李家客廳裏常是賓客滿座，談笑風

生。李先生溫文沉靜的學者風度，和他充滿智慧談吐，以及徐櫻女士的熱情爽朗性格，和她親切而自然的招待，常使我們這些流落海外的晚輩書生，感到家庭的溫暖，和親長般的照拂。」我從兩位前輩所受的照拂，則又遠較一般朋友為多。

李先生在西城時，不但他家的宴會總走不了我，即在平日並不請客的時候，伯母也常會打電話到我的辦公室：「還在那裏用功啊？等會兒過來吃晚飯吧。」每次去了，常常是伯母在廚房做飯，我和李伯伯就坐在附近的櫃檯旁邊，一面吃伯母自己做的五香花生米，一面閒談，偶然也幫一點小忙。飯後陪着兩位前輩談天，往往是到李伯伯在壁爐前面的沙發上靠着睡着了，我才告辭。是在數不盡的這樣充滿家庭氣氛的場合，我一點一滴地接受兩位長輩親切的指點教誨，和無形的薰陶，漸漸懂得了一些作人的道理，走上樸拙踏實的道路。

我和家兄幼時，家父曾經手書「馬援誡兒子書」中以下幾句訓勉我們：「龍伯高敦厚周慎，口無擇言，謙約節儉，廉公有威，吾愛之重之，願汝曹效之。杜季良豪俠好義，憂人之憂，樂人之樂，清濁無所失，吾愛之重之，亦願汝曹效也。」這一則庭訓很早就已經為我們兄弟指出了作人的方向。年事漸長以後，我總覺得「廉公有威」四字未免有些聲色俱厲，對於像我這樣從讀書到教書，從未離開過校園的人，並不一定是很適當的座右銘。方桂仁伯逝世以後，我忽然憬悟，如果把「廉公有威」改為「淡泊寧靜」，則「敦

厚周慎，口無擇言，謙約節儉，淡泊寧靜」，這十六個字，豈不正是李伯伯作人最好的寫照？早年家父訓勉我們兄弟的作人方針，實在與李伯伯底作人風範，不謀而合。因此我進一步領悟到，二十六年以來，方桂仁伯實在我下意識中所追求效法的楷模。雖然有些不自量力，但是蒙他不棄，能有長期親炙的機會和緣份，這實在是我今生一大幸事。今者先生遽歸道山，使我痛失典範；但是作為一個作人的楷模，先生底形象必將永遠存在我底心中。

中西繪畫均具造詣

西諺有云，每一個成功的男人後面，必有一位偉大的女子。如果有人要挑毛病，此語自然也有毛病可挑；但是李夫人徐櫻女士，却正是這樣一位了不起的人物，徐櫻伯母是民國初年威遠大將軍徐樹錚的長女，一九三二年（民國二十一年）與方桂先生結婚。她在崑曲和寫作等方面，都有自己獨到的成就，但是她把相夫、教子、治家、理財，看得都比自己的其他事業和興趣更為重要。就我歷年追隨兩位長者所得到的印象，李伯母處事接物的最大原則，就是絕對不讓任何事情干擾先生的教學研究和平靜生活。她為先生安排了一個溫暖愉快的家庭，使他可以無憂無慮地專心工作。

李方桂先生，山西晉陽人，一九〇二年（清光緒二十八年壬寅）生於廣州，早歲就讀於北京師範大學附屬中學，後入清華學堂醫預科，一九二四年畢業赴美，入密西根大學及芝加哥大學改

習語言學。課業精進，連中三元，分別於一九二六、二七、二八，三年連續修讀畢業學士（密大）、碩士和博士（芝大）三個學位。一九二九年他返國受聘於當時新成立之中央研究院為研究員，埋頭研究漢語、西南少數民族語言以及比較泰語，前後共十七年。一九四六至一九七四的十八年間，分別在哈佛、耶魯、華盛頓（西雅圖）及夏威夷四個大學任教，並繼續他的研究工作，其中有二十年（一九四九至一九六九）是在華盛頓大學。

李先生雖以語言學家名世，但在業餘對於度曲、擷笛以及中西繪畫，都有濃厚的興趣和高深的成就。外界知道他擅長崑曲者，頗不乏人，但是對於他的繪畫，知者恐怕不算太多。二十年前，我曾在他的書齋中，見到一本精裱的冊頁，全是他的畫，和當年文士如胡適之、丁文江等人底題咏。數年前他從夏威夷來，我預備了紙筆，求他作畫。時值仲秋，他繪水墨蝦蟹和秋菊各一幅。談笑間揮毫立就，逸筆草草，正是我國文人畫的傳統作風。

李先生相貌忠厚，服飾樸素；對人親切誠懇，不擺架子。恭儉平易，恂恂如鄉鄙之人，但却掩不住一身書卷之氣。曾有遠道訪客，向正在前院剪草的李先生問：

「李方桂先生是不是住在這裏」，李先生答道：「我就是的」，訪客竟然大吃一驚，不能相信。

先生父母兩系，都是官宦世家。他底外祖父何乃瑩（號潤天）曾經作過前清都察院左副都監

察御史，和清朝的最後一任順天府尹（見李治華「紅樓夢法語本的緣起和經過」，歐華學報第一期，一九八三年五月，第二十至二十一頁），而先生自己却能潛心學術，終身不入仕途，打破了「學而優則仕」的長期傳統。盱衡當今我國的學術界，正是「樸拙之人愈少，巧進之士益多」（宋史「蘇軾傳」語）。像方桂先生這樣長期默默努力，與世無爭的前輩學者，如今又弱一個，這就不僅是先生少數親友底損失了。

敬告留學生家長

慰藉 貴子女異鄉作客寂寞的最佳禮品，便是為他們訂份「中外雜誌」。請將 貴子女在國外詳細地址填妥，連同全年十二期訂費新臺幣壹仟肆佰伍拾元（折合美金伍拾伍元連郵費在內）交郵政劃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，本社立即按址按期寄上本雜誌。

訂閱「中外雜誌」「時代文摘」請撥電話五〇六五三一